

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

○ 时永明

[内容提要] 中越两国在 1973 年前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没有争议,从 1974 年起,越南武装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中有些岛屿,挑起主权争端。越南为达到侵占南海岛屿目的,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多项措施。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 南海问题 中越关系 越南外交

[作者简介] 时永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平与发展》杂志编委、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1)06-0019-05

南海问题是相关国家之间存在多年的领土及海洋权益纷争。自去年美国高调介入以来,南海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透出一些紧张气氛。南海问题有从一般性的领土纠纷向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趋势。恰在此时,2011年10月中旬,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应胡锦涛总书记邀请访问了中国。两国就此次访问发表了《中越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并要“共同努力认真落实”此前由两国副外长签署的《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这两份文件遏制了由于南海问题而导致的两国关系恶化的势头,对缓解南海问题,促使有关各方回归理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为落实两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我们有必要厘清双方之间的问题所在,理性地处理分歧。

总体而言,南海问题只是中越关系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双方能够正确处理,即便暂时不能解决,也不会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而如果有任何一方不能正确处理,就有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是否能正确处理南海问题,几乎成了影响今后中越关系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处理南海问题,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政策选择,即:

对南海问题的法理依据是否能够客观对待,对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判断和目标追求,期待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地区秩序问题。

一、中越南海纷争的由来

中越南海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二是权益海域的划分问题,而第一个问题是核心。

(一) 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中越之间本来不存在争议

中国有较多的证据证明自己发现并开始利用南海诸岛,并对之进行了记载和描述。最早的记录是东汉时的杨孚(约公元 50~150 年)在《异物志》中把南海称之为“涨海”,为以后历代所沿用。他又把南海诸岛叫做“崎头”,指出:“涨海崎头,水浅多磁石”。^[1]《异物志》中的记载是中国现存史书中发现的最早的记载。《异物志》原书虽已失传,但直到清代和近代有关海南岛的方志记载,也引用《异物志》此文,表明了涨海崎头与现今的西沙和南沙有

[1] 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27。

关。^[1]而越南本国的历史,从鸿庞氏到赵朝结束,为传说史,“并无考证确凿的任何遗迹可寻”。“从汉武帝取赵氏的南越之地起直到五代时期为止”,为1,000年北属时代。“国人尚未进化,学问很差,没有载籍”,“只能据中国史书来写”。^[2]换言之,在中国的史籍大量记载中国在南海海域的活动的時候,越南尚处于民族形成的初期。

从行使管辖权来看,中国政府很早就将南沙群岛划归中国管辖。据宋朝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唐贞元5年(公元789年)就在海南岛设立崖州都督府,管辖南海诸岛。宋朝则沿袭了这个制度^[3]。而宋朝时中国以海军巡视的方式对西沙群岛实施管辖的事实则记录在由北宋仁宗皇帝(公元1023年至1063年)亲作“御序”的《武经总要》中^[4]。所以最晚中国从宋朝时起就开始对南海诸岛行使管辖权。且此后的元、明、清各朝均继续行使着主权管理。因此,从古代史看,中越之间没有可争议的地方。

20世纪开始,日本人全面侵入南海诸岛。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政府收回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5]。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得到世界的广泛承认。许多国家的百科全书和地图都说明西沙和南沙属于中国,越南也不例外。而且越南还有官方的正式表态。1956年,越南副外长雍文谦在接见中国驻越南使馆临时代办时曾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6]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属于中国。9月14日,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7]。

到此时为止,应该说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越之间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存在争议。

(二)越南挑起南海争端,中越关系恶化

1973年,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签署之后,越南不顾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的无私援助,突然翻脸,以友为敌,掉转枪口指向中国。从1974年起,越南不仅在中越陆地边境不断挑起冲突,而

且还武装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8]。由此,中越之间开始出现南海争端。

越南如此极端的政策变化有着众多的原因。首先是当时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中美于1972年和解,但中苏关系依然恶化。越南出于自身的目的,在中苏之间选择了站在苏联一边。其次,越南在战争接近结束时,已显露出地区野心。它希望借助苏联试图在东南亚寻找立足点的战略,实现自己在印支半岛的扩张梦。第三,此时南海的石油资源已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前西贡政权早已在南海推行扩张战略,因此,河内政府借实现统一之机,在南海问题上也就继承了西贡政权的衣钵。

1974年1月,西贡当局悍然出动海空军侵犯我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并强占我甘泉岛和金银岛。中国军民奋起还击,赶走了南越军队。当年2月24日西贡当局发表一项声明来阐述其对南沙和西沙的主权主张,抛出了一个“长沙”“黄沙”论,将我南沙和西沙群岛分别称为“长沙”和“黄沙”群岛。《声明》说,“表明越南对黄沙群岛的主权的证据”是1630年和1653年间,一位学者编的《洪德版图》。地图的附注“明白指出,远在十七世纪初期,越南当局已经经常派遣船舶和人员到这些岛屿,当时这些岛屿成为‘金沙’(也是‘黄沙’的意思)。这些岛屿就是现在国际上所称的‘帕拉塞尔群岛’”。^[9]1979年,已经统一了越南全境的现越南政府继承了原西贡政权的这个主张,由越南外交部发表一份题为《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的白皮书,提出了所谓对南沙和西沙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越南的“依据”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把史籍上

[1]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24.

[2]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M].戴可来,译.商务出版社,1992年出版.

[3] 中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M](1980-01-30).吴士存,主编.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海南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108.

[4] 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N].人民日报,1951-08-16.

[5] 1979年4月26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中越谈判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M].吴士存,主编.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海南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82.

[6] 戴可来,童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

记载的黄沙滩和黄沙渚说成是今日的所谓黄沙群岛,即中国的西沙群岛;二是把法国殖民当局1933年后对中国南沙和西沙群岛的非法侵占作为其拥有主权的证据^[1]。

对于越南的“长沙”和“黄沙”说,我国学者李金明在其专著《中国南海疆域研究》中,进行了充分论证,指出该说与我西沙和南沙无关,“黄沙渚是理山北部的小岛”,而长沙“其实就在占城附近的外罗海”^[2]。至于越南把法国对中国岛屿的侵占作为依据,在国际法上就更是站不住脚。

越南在此时不顾基本法理和事实而强烈提出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是和其整体的扩张战略密切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越南对外战略调整的产物。

二、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南海问题的发展

(一)中越关系恶化加剧了南海紧张

导致中越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是黎笋集团上台执政后奉行了反华和地区扩张政策。这给两国关系留下的两个重大负资产,一是民族敌对情绪,二是南海问题。

在二战后,有两大因素深深地影响着中越之间的关系,即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又重新遭受老牌殖民主义的欺压。因此,共产党势力在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普遍起到中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作为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兄弟,自然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但是,正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援越抗美的时候,越南却由于黎笋集团的逐步掌权而使中越关系逐渐蒙上阴影。1965年,越南的《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登载了一系列利用历史问题反华的文章,片面宣传中国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历史,含沙射影地攻击现今中国,并编制相应的军事教材,在越南军队中煽动民族仇恨。从1967年秋开始,越南在文化、教育、艺术和报刊等方面,大规模宣传越南古代抗击中国封建王朝侵略的“功绩”,讴歌古代反抗“北方侵略”的“民族英雄”,煽动对中国的民族仇恨。^[3]迄今为止,这些活动在越南的文化中还留

有非常明显的痕迹。随着越南统一的完成,中越关系开始明显恶化。1978年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并在1979年3月3日颁布了矛头直指中国的总动员令,将其总兵力扩充至120万人^[4]。

越南制造民族对立情绪的重要目的之一显然就是伸张其领土要求。据统计,从1975年至1979年2月,越南在中越陆地边境侵犯我边境,制造事端多达3,414次^[2]。1978年,越南更是突然入侵了柬埔寨。这一系列事情最终导致1979年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与此同时,在海上,早在1975年4月,越南就借统一之机开始了占据南海岛礁的行动。据统计,从1975年越南统一之年到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止,越南在南海共占领了26个岛礁。在此期间,1988年3月14日,中越双方还发生了著名的“3·14赤瓜礁海战”。这是由于越南武装舰只悍然向中国在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域进行正常考察和巡逻的船只发起武装袭击,中国船只才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二)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南海问题的发展

黎笋对外联苏、反华、侵柬的政策和对内专制僵化的统治,最终使越南自己陷入外部政治孤立、内部经济困难的局面,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因此,1986年7月黎笋去世后,越共开始进行政策调整。首先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后是在外交上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86年底,越共六大作出重大决策,全面推进革新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努力使越南摆脱社会经济危机。1987年1月,越共中央第六届五中全会决定删除党章和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重新肯定中国过去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决心改善对华关系^[5]。

[1]中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M](1980-01-30)。吴士存,主编。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海南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115。

[2]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3]黄国安。中越关系史简编[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4]于向东。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的全面发展及其展望[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5]张青。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J]。东南亚纵横,2000(2)。

在越南接受中国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主张后,1990年9月3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中央顾问范文同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了秘密会晤,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达成共识。1991年11月5日至10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平协定在巴黎国际会议正式签署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应邀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京举行高级会晤,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两国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

在《联合公报》中,双方达成“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等领土问题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协议。此后,中越恢复了解决海上和陆地领土争议问题的专家级和政府级谈判。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99年12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在河内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25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中越达成这三项非常重要的协议,基本解决了双方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在事关双方未来重大利益的南海问题上,中越关系几乎没有改善。越南变本加厉,又于1993和1998年分别占领了人骏滩、金盾暗沙、奥南暗沙三个岛礁。而为了巩固其对南海诸岛的非法侵占,越南除了在所占据的岛礁上驻有军队,建造各种军事设施外,还在一些较大的岛礁上,如南子岛、敦谦沙洲、鸿麻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等,兴建了起降场、雷达站、气象站、卫星电视天线、灯塔等设施以宣示主权。^[1]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南海的争议并没有对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关系的迅速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将南海问题与双边正常关系发展分开处理的态度。1999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会晤,就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框架达成具有战略高度的共识,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定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2002年2月,江泽民访越在河内国家大学进行演讲时,

对16字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提出中越两国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

三、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与中越关系的大局

(一) 冷战后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冷战的结束。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就已经实现关系正常化,打破了冷战格局的束缚,但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实现正常化。因此,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中国继1989年与印尼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后,又先后于1990和1991年与文莱和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与全部东南亚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此后,1991年7月,中国外长钱其琛作为东盟外长会议东道国的客人,首次应邀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的开幕式。可以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使1989年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孤立中国的企图基本失败。

与此同时,地区合作的步伐也在加快。在经济方面,1989年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在政治和安全方面,1994年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面对新形势,美国希望能够通过介入地区性组织来继续掌控地区安全的主导权,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纳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讨论的步伐,南海问题因而出现国际化趋势。

而越南在冷战后也开始实行现实主义的大国均衡外交,积极发展与地区组织和美国的关系。越南1992年成为东盟观察员,1995年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并于当年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此时,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也开始借助国际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希望东盟能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作用。而东盟随着其十国大团圆梦的实现,也开始尝试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由于东盟有5个国家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因此,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该宣言虽然表明是“希望为和平与永久解决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议创造有利条件”,但还是要由“有关各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不过,至少从形

[1] 季金明. 南海主权争端的现状[J]. 南洋问题研究, 2002(1).

式上讲，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当事方之间的约定，而多少带了点国际化的味道。

(二)越南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一种依靠履行自我承诺，而非外来强制约束的约定。为落实《宣言》，2004年12月7日在吉隆坡举行了中国-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决定成立中国-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中国-东盟联合工作组)并签署了相关文件。文件规定中国-东盟联合工作组应根据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向中国-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提出政策方向以供考虑，包括认定各方为防止争议复杂化或升级而应采取的行动方式。

中国自签署后，从未违反过该宣言，而是积极推动与越南和菲律宾探索共同开发。而越菲两国却相反，2009年1月28日，菲律宾参议院三读通过了2699号法案，即“制定菲律宾领海基线的法案”，该法案将中国的两处岛屿划为菲律宾所属岛屿。而越南则于2007年宣布，要在长沙群岛设立“长沙县”。今年5月，又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举行所谓“国会代表”和地方“人民议会代表”选举。这些行为已经公然地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五条所叙：“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它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的规定。

为掩盖自己的违约行为并强化自己在南海的地位，越南采取了进一步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措施，其主要特点是将域外势力引入南海地区。首先，越南以主办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形式，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混淆视听，把南海问题不断恶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其次，借美国来压中国。2010年，越南借东盟主席国的地位，为美国人在多边场合对中国施压创造条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7月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利用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终于掀起轩然大波，使南海问题迅速升温。

(三)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的挑战

对于中越双方来说，如何处理南海问题首先是

个立场问题。江泽民同志之所以要提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其实就是希望双方能够确定一个解决双边问题的基本立场。南海问题如此复杂，如果以敌对态度处理，则双方难免一战，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如果本着四好精神处理，则定能找到实现共赢的方式。

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危险性。首先，它使介入南海问题的外界因素增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此解决起来也就更加困难；其次，外部因素的介入有使南海问题从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演变为地区安全格局重组的风险；第三，提高双边乃至地区内的对抗性不仅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使中越关系再次陷入敌对状态的危险。

对越南而言，如果不能理性处理南海问题，也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今年以来，在越南出现的一个危险信号，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华游行。越南虽然近些年党内民主改革搞得有声有色，但并不是一个对街头游行给予较高自由度的国家。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越南政府煽动民愤以期达到外交目的的一种作为。但世界上的事往往是复杂的。这种游行首先对越南自身产生了影响，虽然强化了越南国内的反华意识，然而同时对政府造成政治压力，反而使政府的外交政策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其实，从更深的层面看，凡是试图操纵社会意识的举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积极拉拢越南，有着很深的战略意图。一方面，它想利用越南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要寻找机会影响越南的政治走向。果然，今年8月当越南政府开始想到要管理游行示威活动时，美国人马上就出面进行干预，要求越南政府释放被捕人员[路透社2011年8月23日消息]。

最近，越南领导人访华，中越高层领导在南海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对中越双边关系的发展、对南海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地区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两国关系要真正实现持久稳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收稿日期 2011-10-21]

Abstract

1.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by Ma Jiali, Executive Director,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China Forum on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DPS. By pushing ahead with reg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s, settlement of border disputes and combating terrorism and secessionism, China tries to maintain its major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o express its security concerns over the stability in South Asian Region.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China has gone beyond a unilateral security limit and placed emphasis on the need to carry out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pursuit of a common security for the South Asian Region.

2. The Prospects for Develop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y Wen Fude,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with Sichuan 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have confronted China and India, such as the openness to markets, currency revaluations, energy requirements, etc. After they found ways of overcoming drawbacks in trade imbalance and certain similarities in their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 bilateral trad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seen impressive growth as manifested in the continuing increases of the mutual investments and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in labor services, thus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ensuring cooperation in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3. The U.S. Hyde Bill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India, by Zheng Shan, a professor at the PLA Army College based in Kunming and Liu Liqin, a lecturer at the same college. Since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fter India successively conducted nuclear tests and became a de facto nuclear country, the U.S. had passed the Hyde Bill and then 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gave its approval to the U.S. for providing India, which has not up to now joine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with nuclear technology and nuclear fuels, thus further clearing away legal obstacles for nuclea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India. Their cooperation has made many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regulation mechanism loom up, and thereby putting a brake on the functions of that mechanism and operations of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s a result,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s enmeshed in a gridlock and world peace encounters “nuclear dark clouds”.

4. New Developments in India-African Relations and China-Indian Cooperation in Africa, by Wang Xinying (F.), a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Marxism with Dali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Since the new century, India has been very keen in developing its ties with Africa and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political, economic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field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e motive behind India's policy to foster ties with the African countries came from its dream of becoming a big political power, its great needs for energy, its thirst for the newly-emerging markets, and its practical demand for maintaining regional security. It is certain that India will continue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on Africa, push forward all-rou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ry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re has a vast and ample space for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th regard to matters pertaining to Africa, so as to bring about a win-win resul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for India, China and Africa.

5.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China-Vietnamese Relations, by Shi Yongming,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Peace&Development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No source of contention over ownership of the island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ever existed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prior to 1973. Since then however, Vietnam has invaded and occupied some of the islands on the Nansha Islands, thus provoking major disputes, Vietnam has actively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push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Subsequently, that issue has

proved to be a challenge to the China–Vietnam relationship.

6. A Proving Ground for Trials of Strength: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by Shi Xiaoqin (F.),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Warfare Theories and Strategic Studies with the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coming a wrestling ring for gamesmanship with various players in the region. The issue mingles the U.S. shift of its strategic focus to East Asia with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and the balancing acts by the other ming les countries in East Asia. The focus of contention will be the issu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 In order to safeguard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China should have three pillars at its command: reliability in its strategic deterrence against the U.S., credibility of its good–neighborliness policy and be one heart and mind of the whole nation.

7.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Readjustments of Its Asia–Pacific Security Strategy,

by Dr. Ruan Jianpi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have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its China strategy. As China is rising and the U. S. strategic focus is moving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are playing even more specific roles in the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regi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emphasis of the U.S. arms sales will shift from maintaining control of the air to increasing costs as much as possible on China’s military actions, and in this way further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military coordination with Taiwan. Meanwhile, by deliberately linking the Taiwan issue with the other disputes, the U.S. is trying to promot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Hub and Spoke” mode into a kind of collective security networks, i.e., to build up a NATO–type network in Asia.

8. The Occupy Wall Street: A Bad Situation brings about a Great Resistance,

by Wang Xianyun,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initiated in mid–September, has not only spread quickly to the whole of the U.S., but also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Directly perceived through the scenes,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the public protests were derived from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financial circles, widening of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sharpening of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ferocious in–fight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t present, the protests are at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getting popular supports from within and extending their influence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s to whether they will become social activities of far–reaching importance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protest activities have shown clearly the deep–rooted crises of capitalism and deep–rooted defects of the 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s. They have also given a reflection of the basic laws and new tendenci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ation age. Its impacts on the U.S. political, social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will gradually become visible.

9. The U.S. Debt Crises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etup,

by Zhou Jiamiao(F.),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Nanjing University, and Dr. Cheng Hongliang,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with the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nge in national debts relations has always been seen as one of the external expression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vicissitudes of international setup. The U.S., has changed from a net creditor nation into a debtor nation,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The U.S. debt crises, which erupted in August 2011 was a result created by the combined multiple elements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cluding a globaliz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en–year–long war on terror, loss of the development bearings by the U.S. and an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of the domestic politics. Even though the U.S. will still retain its position as the super power in the world for a rather long period of time, its relative strength is declining. At